

店舖靜靜起變化

那天經過旺角，有店舖關門大吉，也有店舖門庭若市。新冠肺炎疫情加上暴亂，香港經濟大受影響，店舖關門，可以理解，但另一家店卻人頭湧湧，就令人特別好奇。那「旺店」賣的是口罩、眼罩、酒精搓手液、漂白水、洗潔精、抹手紙、毛巾、小掃帚、小拖把、小垃圾桶等等，全都是家居用品，產地來源海內外都有，每種物品都標上了價格，頗大眾化。店子裝修簡陋，但燈火通明，店員不多，看來並不作長遠經營，只賣過渡時期的抗疫物品。

這家「旺店」，估計前身可能是藥房，因疫情加暴亂，生意欠佳，但店主選擇不開門，口罩、消毒水等貨源，店主並不陌生，稍作轉型，又可以另起爐灶，繼續營業了。又或者，老闆之前並未開過店，今次是藉着客觀大環境，自找貨源，這就比前者需要更努力，也更辛苦。無論老闆是許人，背景怎樣，看其生意滔滔，給人的印象總是正面的，令人覺得店主是想爭取做點小生意，掙點錢餬口，總比什麼都不做，只「坐着等運到」強，令人佩服。

筆者想到一個任職藥房的藥劑師朋友說，藥房日前從原先的舖位搬到不遠處另一個舖位，此因新舖位租金較便宜，為了節省開支，老闆搬到那個舖位去，是想繼續做生意，不想停業。新舖之所以較便宜，是因為那邊人少。店員幾個月前已經一起減薪，共渡難關。不畏艱辛的精神，令人感動，這店了不起。



HK人與事

疫症初來時，為了提醒市民保持「社交距離」，當局限食肆四人一桌。食肆生意也因此一落千丈。沒多久，大廈信箱多了不少食肆的割價、外賣自取打折等宣傳單張。街上也多了送外賣的人。逆流而上是考驗，咬緊牙關跨過去，誰有耐性，誰能變通，誰就是贏家。

疫情緩和時，政府放寬食肆至八人一桌，也多次給企業發放「保就業」資助。政府解生民於倒懸，但長貧難顧，生民也要救自身於危難，自己想辦法求存，從來都是香港人的強項。

只是，有些人為了種種原因，縱使歐美疫情和政局比香港嚴峻得多，還是想到盡快移民。聽說有人急著賤價賣舖「套現」，不惜把年前在深水埗買下、原價一千五百萬元的舖位，割價至七百一十萬元出售。香港是個移民城市，從來都有移居海外的，但也有更多回流的。到了海外，自己能否從頭做起，能否做「一等公民」，自己的決定，有何後果，由自己承擔。上述那廉價舖位，搶購者有二十人之多，你不做我來做，堅守香港家園的人還是佔大多數。

關閉多時的海洋公園已重開，今年國慶煙花匯演，現正接受贊助申請，這都是好事。筆者期望港區國安法早日落實，香港人早日重享安定繁榮的日子。



故宮建築祝勇

溥儀離開時走過的神武門，如今成為故宮博物院的正門。故宮博物院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成立。成立前幾天，清室善後委員會理事長、也是故宮博物院理事長的李煜瀛先生，在文書科內，將黃毛邊紙黏連起來，長達丈餘，舖在地上，半跪在地上，書寫了「故宮博物院」五字院匾，懸掛在神武門上。

吳祖光先生之父吳瀛先生是故宮博物院的創建者之一，曾任北洋政府內務部主管故宮的官員。家人在整理新鳳霞和吳祖光遺物時，發現了吳瀛先生寫於一九四八年十月到一九四九年七月時的手稿，其中詳盡實錄了故宮當年創辦博物院的起因和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。其中，在回憶故宮博物院開幕典禮時說：「那天，北京全城人士，真說得上萬人空巷！都要在這天，一窺此數千年神秘的蘊藏。熙熙攘攘的人們無不抱此同一目的地擁進故宮。我因為家有小車，車子被阻在途中不能行動好多次。進宮之後，又被遮斷在坤寧宮東夾道兩小時，方才能夠前進……」

皇帝居住的紫禁城，從此變成了「故宮」

往事如煙

(過去的宮殿)。

它的主語徹底反轉，由皇帝，變成百姓。自從故宮(過去的宮殿，即紫禁城)建成(公元一四二〇年)至今(公元二〇二〇年)，時光剛好過去六百年。這六百年，分成有皇帝的五百零五年(公元一四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)和沒有皇帝的九十五年(公元一九二五年至二〇二〇年)。

到二〇二五年，故宮博物院將迎來它的一百周年，屆時，我將有一本關於故宮博物院的書，獻給大家。

一九三一年，不願再忍受這一帝、一后、一妃的「三角關係」的文繡，向法院起訴，與溥儀離婚。她也成為中國幾千年帝制歷史中，第一位與皇帝離婚的妃子。翌年，文繡在為北平的府右街私立四存中小學的國文和圖畫老師，恢復了原名：傅玉芳。這是文繡離開溥儀，回到北平後的第一個職業，自食其力，讓她的心情特別愉快。她粉筆字寫得好，嗓音清亮，講解國文明白透徹，學生們都非常喜歡這位新來的傅老師。她終於成為自己希望成為的那個人。

而溥儀一生都沒有弄清，自己應該成為的那個人究竟是什麼模樣。在我眼裏，他其實是一個流浪者——他有自己的新娘，但他沒有自己的家。他坐擁九重宮苑，但他不屬於它。他嚮往外面的世界，但當他離開了宮殿(儘管是以被迫的方式)，卻不知道自己該去哪裏。他名為皇帝，卻無家無國，直到晚年，才找到了他的國，在共和國國民這樣一個新的身份裏，安然老去。

婉容一九四六年死於延吉，無棺無槨無碑。作為一個受到新思想洗禮的年輕人，她追求一個普通女人該有的幸福，卻又拚命維繫着皇后的光環，她一生的悲劇，由此注定。

二〇一五年，故宮博物院舉辦「光影百年——故宮老照片特展」，展出清宮老照片三百餘張，其中許多從未公開。這些照片中就包括若干婉容的照片。婉容的溫婉容顏，在九十年後，已經變成了文物，代表着無法重返的舊日時光，而它們展出的地點，正是她離宮時走過的神武門。

工作人員提示，閉館時間快到了。鄧倫、周一圍和鄒君梅想起之前和工作人員的約定：一起復原門檻，協助他關上宮門。

他們回到約定的地點，和工作人員一起裝回門檻，再一層一層關上宮門，最後，穿過閉館後安靜的宮殿，一起走出神武門。

紫禁城佇立在身後，把往事雲煙、時代巨變，都深藏在恆久的沉默裏。

(「告別神武」之七，標題為編者加，全文完)

多才多藝的「百劍堂主」



如是我見 吳捷

一九五六年末開始，金庸、梁羽生與「百劍堂主」曾在香港《大公報》「大公園」合作「三劍樓隨筆」專欄三月有餘。金、梁日後名聲大噪，百劍堂主則雲隱歷史濃霧中。其實梁羽生一直推重其詩，雜文中一再提到他的真名與筆名，一九九七年更以一篇悼故人文揭開百劍堂主的身世。他叫陳凡(一九一五至一九九七)，在《大公報》工作四十餘載，是香港報業黃金時期成就的一代文人的典型。

「三劍樓」時期，金庸正連載《碧血劍》和《射鵰英雄傳》，梁羽生同時在寫《七劍下天山》和《塞外奇俠傳》，陳凡則以「百劍堂主」為筆名於《新晚報》連載《風虎雲龍傳》，為反清人士聚義行道故事，各式武藝的描寫詳細而精妙。連載結束，結集四冊出版，共六百餘頁。陳凡在《大公報》編副刊多年，自己也寫專欄，歷年結集有《百劍堂雜筆》、《燈邊雜筆》、《亂葉集》、《塵夢集》、《秋興集》等。他寫古典文學、國畫、掌故、影評，樸素扎實，有感而發，因興而考，其中談書之文無不洋溢着對書籍的熱愛之情。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《梁任公詩稿手跡》，「玉扣紙線裝，樸雅大方，墨色蒼潤；」三種元明雜劇集，有的影印本「版式精，刻工細」，每一劇之前「均有精美木刻插圖，用粉紙印刷」。抒情寫景的小品，文字雋永。如《茶情·茶品·茶煙》：「山中雨後，清泉掛崖，綠影在簷，涼風入抱，壺傳絮語，鳥轉好音，主客對弈，不知日斜。」陳凡自云，「我這些不成樣子的東西，……都是在不知怎樣的時候匆匆寫成的。」(《贊忙》)

寫小說和專欄只是陳凡的「餘事」，他的記者生涯自一九四一年加入桂林《大公報》開始。梁羽生佩服陳有「俠氣」，緣故之一就是他不辭艱險，走南闖北；抗戰時期更翻越十萬大山，寫出「中越邊境見聞」系列報道。歷年所寫報道和通訊結集為《一個記者的經歷》，凡三十四萬字。陳凡說自己生長於「一手泥漿、兩腳牛糞」的農村，覺得「華堂煥金玉，不如野風開白蓮」。(《農遊粉嶺》)他以入世的激情報道並評說時代



▲一九五〇年代香港大公報籃球隊隊員合影，後排左二為查良鏞(金庸)，左三為陳凡(百劍堂主) 資料圖片

的苦難和矛盾，花甲之年尤有卧薪嘗膽的自勵精神。老友曾敏之為他寫的悼詩有句「不問虛名值幾錢，只憑肝膽照幽燕」。

梁羽生說陳凡的舊詩「學究氣很少，才子氣頗濃」。一次二人散步，談起佛家的「漸」與「頓」，陳凡說自己的詩也如禪宗，「主張妙悟，功力不深，但自信還有性靈。」梁曾在《三劍樓隨筆》中引陳凡《吊蕭紅墓》一詩：「年年海畔看春禩，每過孤墳息旅笳。黑水白山鄉夢渺，獨柯芳草舊情空。滄波不送歸帆去，慧骨長堪積垢封？生死場成安樂地，豈應無隙住蕭紅！」陳凡又曾化名「中宵看劍樓主」，與梁合作《草莽龍蛇傳》開篇七律以為代序。頸聯「亦狂亦俠真名士，能哭能歌適俗流」，四十年後梁羽生借用於其輓陳凡聯：「三劍樓生證平生，亦狂亦俠真名士；卅年事何堪回首，能哭能歌適俗流。」其實陳凡起初是寫新詩的，有《漫步集》、《海沙集》、《無華草》、《往日集》等。

陳凡對書畫的鑒賞力也很高。他推重齊白石、黃賓虹的畫、畫論和印，為二人編成《畫法要旨》、《齊白石詩文篆刻集》等多部專書。陳凡本人詩、書、畫、印之才，則集中展現在一九七七年澳門於今書屋出版的《出峽詩畫冊》中，其中收錄他一九七五年五月隨香港愛國新聞界參觀團回內地參觀，經三峽「率意點染」水墨寫生三十二幅。陳凡驚於祖國山水之奇，見沿途工廠、碼頭、稻田而「有人生難遇之快」。畫、題畫詩文、印章，組成立體的遊三峽通訊，集新時代

記者的敏銳與老派文人的雅趣為一體。出版後，錢鍾書為題七絕《陳百庸凡屬題〈出峽詩畫冊〉》二首，有「毫端風虎雲龍氣，空外霜鐘月笛音」句。風虎雲龍，暗合陳凡早年武俠小說題。

畫冊中的畫，是「亂頭粗服」的寫意。題畫之文或詳述作畫緣由，或抒一時之情：「峽中常見雄嶺之山，崖巔懸一二老松，更顯風霜不拔之氣，予酷愛之。」題畫詩則包括雜言絕句、口號，如「江水湯湯，江聲破破，江風江雨蜀山蒼」；過奉節向白帝城，有詩：「杜公愁聽暮砧聲，家破秋深白帝城。我恨不能攜李白，一船歌嘯下江陵」；都是其一貫的流麗與蒼健風格。畫皆有印，印文包括古文、小篆、隸書和一二甲骨變體，有趣者有：「短褐論交天地間」、「大膽匪類」、「不怕死」、「賤骨頭」、「無止境」、「大鈍」、「有頭角」、「陳凡餘事」等。

可用來描繪陳凡一生的詞語很多。他當過記者和編輯，編過報紙專欄和專書，寫過新詩、舊詩、政論、小品、武俠小說，能書能畫能刻印。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香港報業的黃金時代，成就了陳凡和他那一代多才多藝的文人：葉靈鳳、唐人、梁羽生、金庸、梁厚甫、三蘇、曹聚仁等。時勢與社會人心都在變，那個時代已不可再得。只是透過那一代人的詩文書畫、對聯印章，依舊能感到活潑跳躍的生命力和棱角分明的個性，彷彿畫中山水，縱然隔着紙墨，仍有青翠淋漓，撲面而來。

患難遇貴人

黃麗松校長生於一九二〇年，傳奇的一生像一部影畫戲。在日本侵佔香港時，他從香港逃難到內地，然後在戰雲密布的烽火年代，怎樣開展他的學術生命，而且一年比一年精彩？他一生獲取四個博士學位，包括一個榮譽法學博士學位。教學初期，四年間，他由講師晉升為講座教授。他是香港大學第一位華人校長，還是新加坡一所大學的創校校長。他為香港貢獻良多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之一。

黃校長個子小小，作風低調，溫文爾雅。若不了解他的來歷，我相信不少人無法從他的外表猜想到他的內心有多麼強大。我認識他這麼多年，聽他談及無數經歷，都只說感恩的話，在他口中的人生就是兩個字——恩典。

黃麗松的爸爸是香港民生書院的創校校長黃映然先生，為人儉樸勤奮，十多年在校工作，只拿取五十元月薪，從來沒有加薪。小時的黃麗松與家人，住在位於九龍城啟德濱的臨時校舍天台。他小四結業後直接升讀中一，在中學和大學時期，分別遇上兩位改變其生命軌跡的英國人。在他大學四年級的某一天，香港失守了。青年時期的黃麗松決

定逃難回鄉，那時大學頒發戰時學位的建議獲得通過，倡議人Walter Brown(理學院院長)被日本人關進集中營之前，為黃麗松寫了一封證明學位資格的書函。黃麗松本想把信件放在皮鞋中，後來怕日軍沒收品質好的東西，最後他把文件改放在布鞋中，結果他的部分行李真被奪去了，信件還在。逃難的過程艱苦，其間他染上瘧疾，死裏逃生。

黃麗松後來輾轉去到桂林廣西大學研究桐油，竟然遇上從前民生書院自己班上如同兄長一樣的英文老師John Blofeld。當時John是英國文化協會的大學交流專員，到桂林訪問，二人戰亂相逢，恍如隔世。離開桂林時，John要求黃麗松把畢業證明交他帶走。那些年沒有複印機，唯一的正本不能丟。黃麗松雖然不知所以然，還是選擇了相信和交託。結果兩個月後，John來信表示他剛剛成功為黃麗松申請羅氏基金會的獎學金，現在立刻可以送他上英國牛津大學攻讀研究院，他便成為首位獲得該獎學金的亞洲學生。赴英前，他們相約在重慶，黃麗松重新把畢業及獎學金證明書都放在布鞋中，然後安心上路。

清唱



姚文君 文化什錦

京劇的演唱，有彩唱、清唱之分。彩唱就是粉墨登場，通常是演一齣整戲，「唱念做打」全活兒；清唱則是身穿時裝，規矩地站在舞台上，唱上一兩段、幾分鐘。

如今的生活節奏快，人們缺少耐心去看一齣整戲，清唱漸成為人們欣賞了解戲曲的快捷途徑。有不少演員之所以出名，就是因為經常在電視、晚會、各種聯歡的清唱中露面。觀眾也因為清唱熟悉了不少唱段，但對這個唱段所歸屬的那齣戲，往往不甚了了。這麼看來，清唱恰似一種文化快餐，與彩唱相比，就如同一篇公眾號文章與一本書的區別。

京劇名角張火丁明確表示不喜歡清唱。她認為，只斷章取義地演唱某一段，時間短促，演員來不及代入到戲中，無法調

動起內心的情感，也就唱不出聲情並茂的唱腔。的確，清唱的唱段，和植在戲裏的那個唱段，貌似是同一個唱段，其實是一個是樹上的果子，一個洗好了擺在盤子裏的。

有一年春晚，李光清唱京劇《打金磚》選段，最後一句「又聽得殿角下大放悲聲」，當時的劇情是，劉秀酒後誤殺姚期，馬武聞訊哭喊着衝上殿來，所以劉秀聽到了「大放悲聲」。但是，在春晚晚會出現這樣的唱詞顯然與喜慶氣氛不諧，於是改唱為「又聽得殿角下笑語歡聲」。這樣與劇情嚴重背離的清唱，顯得十分滑稽，但能夠嘩眾取寵。

有人會說，是不是清唱就比彩唱容易些呢？不見得。彩唱塑造的是戲曲人物，「一萬個人心裏有一萬個哈姆雷特」，因

而容易過關。況且，一整齣戲的時間很長，這一場沒發揮好，下一場還有機會彌補，甚至還可能有更出彩的機會。難的倒是清唱。清唱中，演員以本來面目示人，時間又短，靠幾分鐘時間俘獲觀眾的心，就必須唱拿手戲，唱最熟悉的唱段，這是訣竅，可以提升成功的概率。

人生如戲，我們粉墨登場，努力演好人生這齣大戲，有高潮，有低谷，有開場，有謝幕。在彩唱中，人才有活得踏實、舒展的感覺。而嚴格地說，清唱原本就不算演戲，它只是正規表演的補充方式，或是一條在無奈中被發現的捷徑。每個戲曲演員，都同時經歷着彩唱與清唱。我們的人生亦是，既想踏踏實實過好這一輩子，但看到機遇，也都搶着要去亮一嗓子。